

中国上古女神神话研究现状综述

——兼论研究方法及其研究意义

马玉珍

(兰州理工大学 文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50)

摘要: 中国上古女神神话是中华民族文化、民族审美习惯“活”的呈现。尽管我国的神话产生历史久远,但它一直处于早期文化建构中非主流的地位,研究历史短暂,直到20世纪初,一批受西学思想影响的学者纷纷涉足神话领域,通过对女娲、嫦娥、精卫、高唐女神、山鬼、西王母等女神的研究,正式拉开了对中国上古神话探讨研究的序幕。这些学者研究的角度不同,方法各异,尤其是西方神话学研究方法、二重、三重论证方法的渗透,尽管研究时间较短,但研究成果较为丰硕。当然每一阶段学者对上古女神的研究存在着不均衡性,尤其缺乏整体系统性观照,因此对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意义进行简要探析对今后研究具有指导意义。

关键词: 上古女神; 神话研究; 女性地位; 文化遗产

中图分类号: I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351 (2015) 05-0012-07

每个民族在其成长过程中都积淀了属于这个民族的标志性的文化,神话便属于此类,神话在某种程度上是引领这个民族走向文明的“经幡”。中国上古女神神话是中华民族文化、民族审美习惯“活”的呈现。尽管我国的神话产生历史久远,但它一直处于早期文化建构中非主流的地位,研究历史短暂,直到20世纪初,一批受西学思想影响的学者纷纷涉足神话领域,通过对女娲、嫦娥、精卫、高唐女神、山鬼、西王母等女神的研究,正式拉开了对中国上古神话探讨研究的序幕。这些学者研究的角度不同,方法各异,尤其是西方神话学研究方法以及借助考古的二重、三重论证方法的渗透,拓宽了对上古女神神话研究的角度。学者们对上古女神神话研究时间较短,但研究成果较为丰硕,当然每一阶段学者对上古女神的研究存在着不均衡性,尤其缺乏整体系统性观照,因此对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意义进行简要探析对今后研究具有指导意义。

一、中国上古女神神话产生与研究 经过漫长的待滞时期

从上古女神神话生成到被学者关注的漫长等待时期,我国上古女神神话多以零星、片段的形式被保存,有人质疑“认为中国文化史上没有产生过像古代希腊、罗马或北欧等那种比较有体系的或情节

完整的神话和传说。”对此钟敬文先生认为:“中国的过去,因为种种的关系,在比较古老的一些文献上,仅保存了若干断片的、简略的神话和传说……但因此断定中华民族的文化史上,必不会产生比较有体系的情节完整的神话和传说,那光就理论上讲,也不是很通顺的吧。何况在事实上,更有着足以摇撼这‘见解’的证据呢。”^[1]钟敬文先生所谓的证据是什么呢?从20世纪以来中国学者对神话、尤其是上古女神神话的研究成果中可以找到依据。

母系氏族社会是人类社会产生的早期阶段,也是产生上古女神神话的重要阶段,上古女神神话是诸多神话的源头,女性在这一阶段具有较高的被尊崇的地位。法拉格在《思想起源论》里认为:“对于粗心大意的和无远见的野蛮人,妇女是神明:她支配着他的命运从生到死。人根据事变和自己的日常生活上的知识收获而制作意识形态,他终于开始把妇女加以神话。”^[2]上古女神神话是中国神话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中国神话中“原生态”神话。陈建宪将神话研究分为三类:第一类,按照“原始氏族公社时期及其以前的初民所创作和讲述的神话”的纯粹自然的“原生态神话”;第二类,属于“产生于原始氏族公社时期及其以前时期,但流传于这一时期之后”的“在民间以及口头流传的再生态神话,如嫦娥奔月、精卫填海等”;第三类,产生于原始氏族公社以后,由母系氏族公社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时期,在民间流传以及出现在文献典籍中的

收稿日期: 2015-06-15

作者简介: 马玉珍(1971-),女(回族),青海西宁人,兰州理工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

女神。^[3]

神话产生及传播的过程也是人类文明不断推进的过程。仅就文献记载的神话传说材料来看,我国上古女神神话存在于传世文献的叙事方式有如下特征:第一,以零碎的材料存在,语言单薄、简略。针对世界其他民族相对发达、记载详实的创世神话、人类起源神话,中国上古神话的记载就显得单薄简略得多;第二,文献记载的上古女神神话缺少连贯性和条理性,在流传过程中出现神格互渗交叉或衍生的情况;第三,神话在接受和传播过程中出现了移栽、交叉以及转换的情况,以致对神话人物神格判断出现了争议;第四,神话故事叙事简单,故事缺乏逻辑性;第五,上古女神神话一般在流传的过程中经历了神话的历史化、伦理化、世俗化这样一个流变过程,这个过程使很多神话被删减或重塑;第六,随着父权制的强大,上古时期的女神独立个性、被尊崇的地位随着男性话语权的强大而集体走向没落;第七,随着宗法制度的形成,伦理道德规范的强化,上古女神神格出现降格现象,女神逐渐依附于男神,所以早期出现的女神神性被后来的男神所取代。

无论女神神话经历了怎样的传播过程,仅从分析我国上古女神神话的接受和叙事方式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原始社会母系氏族社会阶段正是中国上古女神神话产生的重要阶段,尽管记载较为零散,但正因为上古女神神话经历了从产生到研究漫长的待滞时期,不能因此抹杀中国上古女神神话的存在性。

二、20世纪以来研究上古女神神话的特点及研究的各阶段

自20世纪初,一批受西学思想影响的学者,如鲁迅、周作人、茅盾、蒋观云、夏曾佑、顾颉刚、陈梦家、黄石、林惠祥等纷纷涉足神话领域,正式对中国上古神话进行全方位深入的探讨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学者们对神话的研究都无法避免对上古女神的研究,上古女神神话作为中国神话史上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神话的起源部分,同样受到了学者关注。20世纪以来学者对上古女神神话研究主要体现为如下特点:

其一,研究方法多样化。从20世纪以来,学者对神话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利用西方神话学理论,从文化人类学、民族心理学,以及社会学、民俗学、美学、历史学、哲学等诸多视角对神话进行探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其二,西方女权思想影响大。上古女神是整个神话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女权运动自19世纪后半叶兴起后,又分别经历了现代女权主义、后现代女权主义几个阶段,这些思潮对我国学者有一定的影响,也激发了学者对上古女神的研究兴趣。在近20年时间内,关于女神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数量超过前期的三分之二多。

其三,对女神的关注点比较集中,多倾向于女神个案的研究。如对西王母、女娲等主要女神的研究出现扎堆的现象,学者对女神个案研究比例失调。

其四,研究角度单一化。学者对女神的研究角度多倾向于神话的文化寓意的探讨及对个别女神原相、演变情况的研究。在对女神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对上古女神神话产生原因、背景的研究,对上古女神族属的研究以探讨女神神话规律性的特点方面,明显有研究力量薄弱,研究成果单薄的情况。

笔者参考刘铁梁的《中国民俗学发展的几个阶段》^[4]的分法,结合学者对女神的研究的成果,对20世纪以来中外学者对女神研究予以总结,以为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00~1926年,为女神研究的萌芽阶段。此阶段主要学者为顾颉刚、鲁迅、蒋观云、周作人,王国维等;“五四”时期思想解放与新文化运动,出现了对女神研究的潮流。

第二阶段为1926年~1940年,为形成阶段。此阶段主要学者为顾颉刚、鲁迅、茅盾、苏雪林、黄石、陈梦家等;国内北伐战争,学者对历史和现状的审视和反思,推动了对女神的研究。

第三阶段为1940年~1979年,为缓进阶段。抗日战争、国内革命战争,此阶段学术研究整体比较低迷,也包括女神神话研究,很多学者将研究阵地转移到少数民族地区,诸如西南等地,深入实地考察,掌握了很多有价值的民间材料。此阶段涌现除了一批研究神话的大学者,芮逸夫、凌纯声、常任侠、丁山、袁珂、王孝廉等。

第四阶段为1980年至今,为复兴阶段。这一阶段学者为袁珂、叶舒宪、孙作云、马昌仪、王孝廉、潜明滋、萧兵等。此阶段有较为宽松的学术环境,也促进了学术的发展。

从上述每个阶段学者对女神的研究成果看,前期研究较为单薄,后期文化交流和学术讨论逐渐热烈起来,研究成果也较为厚重。在众多神话论著中,学者的研究多集中于几个著名神话和神话人物,例如对女娲、嫦娥、精卫、巫山神女、西王母等女神研究关注度比较高,研究成果也相对丰硕,

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从单一性走向多样性。

三、上古女神神话研究现状 综述及研究的局限性

自中国神话出现以来，女娲等重要神祇一直以来都是神话史上很重要的神话人物，缘此，无论是其产生的年限，还是承担的神职，甚至是神话本身肩负的文化元素都是学者关注的热点。除女娲以外还有诸如嫦娥、西王母等女神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神话意义，对她们研究能更直接去了解当时的社会现状和社会心理，从而较为清晰掌握研究动态、研究成果以及研究中的局限性。

(一) 上古女神神话个体研究综述及研究方法探析

1. 对女娲神话的研究，掀起了神话研究的大讨论

女娲是我国上古神话中的大神，研究者多从女娲补天、女娲形象、女娲神话发源地、女娲与伏羲关系、女娲与洪水的关系等角度进行讨论和研究。20世纪以来对女娲的研究分为两个阶段：从20世纪初到1979年为第一阶段；从1980年至今为第二阶段。第一阶段为开创、发展阶段，研究者主要有茅盾、顾颉刚、杨宽、常任侠、芮逸夫、闻一多、王孝廉等。茅盾在《神话杂记》、《中国神话研究ABC》中认为，女娲为中国历史神话中的开辟神话系统的一部分，他认为女娲为北部神话。1936年，芮逸夫的《苗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的传说》是对湘西地区进行田野调查的结果，得出女娲系南方女神，其事迹的核心是“洪水遗民、兄妹结婚、再造人类”的母题。针对芮逸夫先生的观点，马长寿在《苗瑶之起源神话》、徐旭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为之续证。闻一多的《伏羲考》的补证力度更大，认为：“‘兄妹配偶’是伏羲、女娲传说的最基本的轮廓，而这轮廓在文献中早被拆毁，它的复原是靠新兴的考古学，尤其是人类学的努力才得完成的。”闻一多认为伏羲女娲故事中的兄妹是汉籍中的伏羲、女娲。对以上说法，台湾学者王孝廉在《伏羲与女娲——闻一多〈伏羲考〉批判之一》一文予以反驳，认为西南诸族的“兄妹神婚”的神话要素与汉民族所传的伏羲女娲，并没有什么“必然”的“关连”，如果说汉文化与西南诸族的交流中相互吸收了彼此的神话，“那自然是可能的事情”，但这是神话交流、传播与影响的问题并非“神话的起源问题”。对女娲神话的研究值得重视的还有顾颉刚、杨宽合写的《三皇考》，文

中考证三皇之一的女娲神格的升降及形貌的变化，这是古史辨派通过历史的眼光考证女娲的起源及神格的演变。此外还有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书中尝试用唯物史观解释女娲神话，为后来学者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可见此阶段对女娲神话研究的某些问题，学者们尚未达成共识。第二阶段对女娲神话的研究，学者多以民俗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相互渗透，研究方法多样，研究时涉及的领域也较为宽广。著名学者有钟敬文、袁珂、萧兵等。涉及的问题有女娲与葫芦文化、女娲与图腾崇拜、女娲与洪水神话、女娲与生殖崇拜等。刘毓庆的《“女娲补天”与生殖崇拜》是从人类起源方面探讨女娲的功绩，杨利慧在《始母神——女娲神格的基点和中心》一文及两部著作《女娲的神话与信仰》、《女娲溯源——女娲信仰起源地的再推论》中从多方面对前期学者关于“女娲南来说”进行辩驳，产生了系列女娲研究成果。她主要通过通过对北方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在田野调查后搜集到大量的民间材料，利用历史学、地理学、文献学，借助出土文献和考古成果，论证女娲信仰最初始于西北。她还具体指明是甘肃天水。通过学者们的讨论，以及所掌握的田野调查资料，自然形成了关于女娲信仰始地的“南方说”和“北方说”两个派别。杨利慧的论著大体上解决了这一争端，厘清了女娲神话产生、传播的基本过程。过文英的博士论文《论汉墓绘画中的伏羲女娲神话》借助出土文献来研究女娲，作者通过对影像的比对，将大量出土材料整理归类，这是分析研究女神的一种新方法。学者们对女娲的原始面貌、其族属、图腾性质与伏羲关系等重大问题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由于女娲神话流传时间久远、分布地域广、传播方式不同、表现形态各异，需要借助多学科渗透和多重证据，方可探明真相。虽然关于女娲的研究成果丰硕，但从中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论述存在缺陷，诸如民俗学、民族学资料欠缺、例证单薄；使用材料不够谨慎，推理欠严密；有些论断虽大胆新奇但有臆断或有孤证之嫌，很有必要利用历史学、地理学，尤其是出土文献等协助探究女娲神话产生、演变的真实面貌。

2. 嫦娥神话的研究，形成了对民族文化的追思

嫦娥神话是中国神话中关注度较高的神话，对嫦娥神话研究大体也可分为两个阶段：从1923年到1980年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是初级阶段，如郭云奇从中国诗歌中阐述嫦娥神话的演变，顾颉刚主要针对原始文献的整理以及散落在其它典籍中的材料的梳理和前人的注评。虽然这一阶段研究论著

单薄，研究人员也不够庞大，但研究的方法、尤其是对嫦娥文献的整理、汇载还是对后来的研究有很大影响。第二阶段，从1981年至今，这一阶段研究者队伍庞大，专著和论文的数量大量涌现。其一，有对嫦娥意象的释读。胡万川认为，后羿“射日”与嫦娥“奔月”原本是无关的神话，“偷不死药、登月而去”的神话和人类对于生命与死亡的看法有关。高海瓏认为“嫦娥奔月”神话的深层结构为二元对立矛盾，该结构揭示了神话表达的关键在于“死亡→再生”信仰及两性对抗。同类意象的月亮、蟾蜍、虎、桂树、兔子，构成了《嫦娥奔月》的神话系统。其二，对嫦娥原型研究。认为嫦娥原型是从蛙神到部落神再到民族神，也就是具有“图腾性质”的动物神到具有“宗教意味”的人格神的转化。还有人认为嫦娥神话文本经历了一个“层累”的演变过程，最终导致嫦娥之数次“变形”，在这位学者看来嫦娥神话的文献记录时间上限被提前到了战国时期，且打破了嫦娥神话从属于羿神话，为嫦娥所担的背夫无德之罪正名，这是嫦娥神话研究的“新时代”。还有从文化人类学的方面来研究的：如曲枫在《“奔月”神话的文化人类学释读》中运用西方学术界有关原始宗教的研究成果，结合我国的考古发现认为“古老的‘奔月’神话乃是出自于上古的宗教仪式。”认为嫦娥女性生殖崇拜说的学者，有关长龙的认为嫦娥奔月神话属于中国的日月神话典型，其中蕴涵了三个民族精神模式：一是太阳神话的象征原型；二是月亮神话的象征原型；三是日月和合的象征原型。从嫦娥意象有否定死亡论的学者：如万建中将嫦娥奔月神话认为是图腾变形神话，表现原始初民的死亡观。有将嫦娥认为是被贬后妃的，纪永贵认为嫦娥是现实中被贬后妃的原型，月宫是幽静被贬后妃的“冷宫”，而玉兔、蟾蜍是冷宫中蓄养的宠物。袁珂先生持反抗父权制度的观点，认为嫦娥由“翩翩归妹”化为丑陋的动物蟾蜍，推想起来必定有“谴责”的意思在里面，其缘由也和她“窃食不死之药事件有关的”。^[5]讨论比较热烈的属月亮死而复生的观点，有钟敬文、吴天明等，如戴霖、蔡运章在《秦简〈归妹〉卦辞与“嫦娥奔月”神话》中认为：“嫦娥奔月神话的深层结构是‘月亮死而复生’为母题的”；从出土文献为依据来做研究的，如李立根据对汉墓神话的考查和分析，联系时代背景，他得出了“有限与无限的生命”概念。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嫦娥神话的研究成果还是很丰硕的，这或许是文人对我国古老的月文化情有独钟有关，虽然研究越来越趋于深入，角度也越来越

新，不乏一些大胆创新的观点，但对嫦娥神话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研究不够深入，研究的视野有些狭窄；对嫦娥神话从文学、美学等方面挖掘不够深入；从民俗学角度深入考察，寻找民俗与嫦娥神话的关联也是很有意义的。

3. 精卫神话的研究，体现了对民族精神的崇仰

学术界对“精卫填海”的研究主要从文化人类学、民俗学、历史地理学等方面着手。在茅盾看来：“精卫与刑天，属于同型的神话，都是描写象征那百折不回的毅力和意志的。这是属于道德意识的鸟兽的神话。”^[6]袁珂先生认为，精卫填海“这个神话带着母权制氏族社会的痕迹”，^[7]倪浓水从“西山”和“东海”两个空间意象入手，认为精卫神话是当时南北历史文化和政治“对抗”的一种“隐喻性”的神话叙事。蒋寅《作为文学原型的精卫神话》从文学原型及文学形象角度研究，认为精卫是中国早期神话中少数仅存活于士大夫精英文学中的原始意象之一。学者们从多领域多角度去解读“精卫填海”的文化意蕴，对“精卫填海”从文化人类学及民俗学结合研究，以及精卫族源研究还是比较单薄，但从精卫神话中产生了一个标志性的神话角色，这个角色具有战斗性、敢于挑战权威、不屈不挠的性格特征，在她作为炎帝女儿，命殉大海，又倔强地与大海搏斗中，人们在研究精卫神话的同时，更崇仰她坚韧的品质，在研究中传播着精卫的精神，这种精神继而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中的一些方面，所以人们青睐精卫神话，更多的是对民族精神的崇仰。

4. 对巫山神女的研究，产生了对女性美的价值判断

近代学者对高唐神女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大概从1928年到1980年，这一阶段主要以闻一多先生的《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为起点，利用考据学和文化人类学相关知识，认为“高唐神女其实是楚民族的先妣而兼高禘神”的“先妣兼高禘”说，这一说法引发了学者的兴趣。陈梦家认为作为“帝之季女”的神女还兼有神巫的职责，^[8]将神女和原始的宗教联系在一起。鲁瑞菁从民俗学角度考察高唐神女是一个早期冥婚先例，其博士论文及张君的《论高唐神女的原型与神性》都在以探讨原型为目的。对高唐神女研究的第二阶段是从1981年至今，这一阶段学者对高唐女神研究成果丰硕。学者多以闻一多先生研究为依据展开讨论，吴天明认为：“用宗教的方式和野蛮的手段”进行“男女媾和”，“以推种群进化，确保种群长久生存”。连锁标认为神女为帝女或尧女，学者针对

《高唐赋》中的“朝云暮雨”捕捉意象，引发联想，认为“云雨”是原始崇拜的一种表现形式，主此说的有杨琳、龙耀宏、叶舒宪、吕美生、林涓、张伟然等。有学者认为巫山神女为尸女即巫儿，兼有神巫的职能，董芬芬在《巫山神女传说的真相及屈原对怀王的批评》一文中认为：“本事发生在楚王与扮神女的巫女之间，反映了楚国祭祀的原始色彩。”萧兵认为她们是一些受人尊敬的女祭司（巫），“有时还由‘圣处女’来兼任这些‘自愿牺牲’的‘宗教舞女’或‘圣娼’”，是“献身的贞女”，“以献身为赎身”的有“时限”的神妓，她们为神“牺牲”，连“有钱”和“身份高”的妇女都不例外，履行“宗教义务”。^[9]还有人主张草神说或灵芝说，叶舒宪力主爱神美神说，在《高唐神女与维纳斯——中西文化中的爱与美的主题》中运用语源学、神话学、原型批评、人类文化学，精神分析学说、民俗学等学科进行跨文化研究，详细考察了存在于中西文化中爱与美主题的原型形象，将高唐神女和维纳斯联系起来，并以纵向的历史考证和横向的文化比较相结合的方法，分别考证了希腊、印度、中国三个文化圈中跨文化的普遍现象，即由原母到地母，由爱神到美神的发生和衍变。在其文《中国文学中的美人幻梦原型》中同样将巫山神女视为中国神话中的维纳斯，具有爱与美的女性美。随着对高唐神女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展，学者多从文学原型、原始宗教、美学角度来分析神女主题，忽视了原型产生时期的社会心理和文化观照，对高唐神女与其它地域出现女神对照研究，挖掘楚文化视域下的社会心理及原始宗教特点，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5. “山鬼”女神在两性间徘徊，学者的研究倾向于溯源与叠加的思考

楚辞《九歌·山鬼》中“山鬼”的研究。清代的顾天成在《楚辞九歌解》里较早认为巫山神女系山鬼，郭沫若在《屈原赋今译》里也是倾向于宋玉赋里的神女即山鬼。当代楚辞学家如马茂元、陈子展、聂石樵、金开诚、汤炳正等，都主《山鬼》中的“山鬼”为“巫山神女”。赵逵夫的研究解决了学术界长期存在的“无论是本事的考索，还是对抒情主人公形象的认识，还是在内容的理解上，学术界都存在着较大分歧”问题。^[10]张崇琛的《“山鬼”考》以《九歌·山鬼》中的描述为内证，以历代文献及当代刊物中有关“野人”的叙述为外证，联系相关论述，得出“山鬼的原型为野人，后被附丽于巫山神女”的结论，此外还有潘啸龙、孙作云都主山鬼即巫山神女说。

6. 对西王母神话的研究，产生了中国神话之乡的讨论和女性地位的反思

在对上古女神的研究中，对西王母神话研究的关注度不亚于女娲神话。对西王母神话研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民国末年開始到1979年，为起步、发展阶段：丁谦将西王母归属于古代加勒底国，其神职为该国的月神，1923年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1928年茅盾的《中国神话ABC》对西王母的演变进行了讨论。刘师培认为，西王母国应是由西向东迁移，和西汉疆域的扩张与东西方文化交融有密切关系。顾实对西王母“辗转推证”，认为西王母之邦有新旧之邦，旧邦在今新疆；而新邦远在新疆之西；新旧二邦溯始远在唐虞之世。日本学者小川琢治在《穆天子考》中讨论西王母的邦国所在地、族属，此说有很多值得商榷之处。丁山认为西王母乃月神与刑神为一体的神灵。从1980年至今，为研究西王母神话的第二阶段，此阶段研究成果丰硕。王珍提出：“青海为西王母地”，萧兵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阐释西王母神话，刘锡诚、刘宗迪等从神话地域渊源研究西王母的属地。张崇琛、李并成等对昆仑神话中昆仑地望的认定为西北。范三畏从西王母的形象特征及其虎图腾，进一步分析西王母与二昊和氏、夷的关系。张勤其文及他的博士论文，系统研究西王母原型意象。韩高年则是从《山海经》入手研究西王母之神相、族属和其它相关问题，认为：“西王母的神相经历了由《山海经》中头戴面具祭厉鬼的司祭者，至《穆天子传》中能歌善舞的部族首领，再至秦汉以后典籍中美丽女神的演变过程。除了神话演进本身的因素外，这主要是由于对西王母原初神相的误解所导致的。”^[11]有学者从出土文献新材料中探讨西王母神话及一些母神崇拜的习俗，如郑先兴《汉画中的西王母神话与西王母崇拜》，陈金文《东汉画像石中西王母与伏羲、女娲共同构图的解读》等，对西王母的探讨还有从文化交融的角度进行研究，如叶舒宪、萧兵、郑在书合著的《山海经的文化寻根》。对西王母神话的研究，第一阶段主要从西王母的地望、族属等方面进行考证。第二阶段的研究除了对西王母地望、族属的研究外，研究视角在不断扩展，如部族的迁徙，东西民族的融合，甚至从汉墓石刻画像来探询母神崇拜的宗教仪式等，但从族属看文化的交融还有可挖掘的深度，另外西王母神相演变，最初的神格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地方。

7. 对上古女神其他方面的研究填补了神话研究的一些空白

学者对我国女神作整体梳理和研究的不多，有一些仅选取部分来研究，其目的大概是想达到一种以树木见森林的效果。胡祥琴分析了古代女神婚姻特点及成因。相比较而言，人们开始有所关注上古女神神话，但研究视野相对比较狭窄，证据有些单薄，缺乏整体性系统研究。民俗学者过伟先生在《中国女神》中较全面地从汉族和55个少数民族中流传的女神材料，属民俗学和民族学材料多，田野调查为主，是一部资料性著作。但论证阐释欠缺，有翔实的人类学资料，但没有形成观点。还有一些学者将女神崇拜释读为早期的生殖崇拜，不免让人有论据不足的偏颇之感，但从中国上古女神群体系统关照的基础上进行分类，分析产生原因、背景及具有共性的特点研究尚属空白。

有人也从中西文化比较的方面进行女神神话对比研究，如潘秋子《中国和希腊神话中爱神的起源及其地位变化差异的探讨》，孙佩霞《中日古代神话女性形象比较》，刘文君《从中国和希腊神话看女性地位之差异》，随着西方比较学的兴起，这种比较研究的方法丰富了研究内容，扩大了研究范围。海外学者对中国神话有一些研究论著，但还没有人对中国上古女神神话进行专题研究。从国外学者的研究中可以看到，欧美学者更注重方法论的探讨，日本学者对地源考证较缜密，但脱离我国历史变迁中文化交融的特点，过于武断地认为中国神话“西来说”的可靠，事实证明，我国南方水田、中原旱地农耕、北方游牧的自然生态因素下文化发展的不均衡，神话产生具有多因性和复杂性，尤其以女神神话为主，其历史久远性和演变的复杂性均未深入谈及。

(二) 上古女神神话研究存在的局限性探析

尽管从上世纪20年代到90年代随着学者对神话的重视而开始关注女神，有一些针对个别女神研究的专论出现，闻一多的《姜嫄履大人迹考》、《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到以后杨利慧的《女娲的神话与信仰》等，概括来说，前期的女神研究存在如下局限性：首先，是对女神族属研究多，注意到个别女神的演变过程，分析演变规律时观点较多，但足以引起学界关注的新观点不多。其次，是上古女神神话的历史化及世俗化演变原因探究有待深入，还有神话、传说、寓言之间关系以及与地域关系涉及不多。再次，是对女神神话传播方式研究不够。如果从民俗学角度入手结合地域文化研究，那么我们前期学者辛苦研究的成果会更深入地得到阐释，不会像对女娲、西王母神话的研究一样，虽然讨论热烈，但有很多重复性的研究，观点也是陈陈相因，

从这个意义上讲，打开思路，广泛吸收出土文献和田野调查，利用多重证据法相互参证，使女神研究脱离主观臆断或历史变迁的错断，还原当时的时代一个真实的记忆，一个朴素的原貌，这应该是神话研究、努力的方向。

四、上古女神神话研究的多重意义

对中国上古女神神话进行研究有其重要文化意义。我们可以将上古女神看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面镜子，以此来“怀念”和“反观”先民的生活状态，用顾颉刚先生的话说：“就是不真的事实也必定是真的想象和传说。只要是真的想象和传说，就可以反映当时的民族文化和社会意识，在研究上具有极大的价值。”^[12]

在目前信息流通便捷的情形下，我们对上古女神的研究方法如果更多元化，如将古籍中散乱的、片段的女神文字文献材料，结合考古材料以及民俗材料，或许更接近于上古时期的初貌，这也不失为文化寻根的一条路径。再如用历史民族学的理论方法，按照神话分布，在所属的区域寻找出它们的“蛛丝马迹”，这就需要深入扎实的田野调查。还有“功能主义”的研究方法，研究者专注于寻找神话的功能，在寻求神话故事对文化、历史等各方面的作用为最终目的。当然引进的“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也不失为一种新思路，它打破了过去旧有的传统方法，不拘泥神话中那些特定的构成要素，而是做全面的整体研究，通过综观整体而产生全新的见解。还有比较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能推动对文化意蕴的深层解读，在比较中找到“个性化”的特质。神话心理学也是一种新方法，弗洛伊德的《图腾与禁忌》中提出的“无意识”的重要性，启发了后来的神话学家对神话释读的方法，另一位心理学家荣格通过找出希腊神话中像狄蜜特这类的大地母神与她们所相对的作梦者之间，有非常规律性的互动原则，从而创造了“原型说”。以上理论对上古女神的研究具有指导作用。我国当代研究神话的著名学者袁珂先生，他提出适宜我国神话的研究方法，袁先生认为我国本土神话研究必须走“广义”的道路。广义的神话是“活态”的神话，渗透于整个人类社会，随着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程在不断渗透新内容后再生成、演化、虚饰，以此生生不息地衍生。本人认为脱离了地域文化背景，无论将神话用广义来界定，还是用狭义来界定，神话也会失去基本的“神性”。

最后，研究上古女神神话具有一定的现实意

义，从上古女神神话强烈的思想性、丰富的人文性、鲜明的民族性中汲取现代生活、现代文化中所缺乏但又为人性所渴望的精神要素。通过对上古女神的探根寻源，从而使我们获得女性对生命的新的认识，对人生、社会价值新的理解与思考，找到当代女神的力量源泉。甚至从上古女神中可以找到我们可贵的民族精神，诸如公而忘私的自我牺牲精神，崇高的抱负，坦荡的心胸，甚至舍身取义的精神品质。女神身上同样反映了我中华民族早期初民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舍小我为大我的奉献精神，从而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这一点在当今这个急功近利、重利轻义、浮华物欲横流的社会，对再铸民族精神很有意义。

参考文献：

- [1] 马昌仪.中国神话学文论选萃序:上[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
- [2] 法拉格.思想起源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102-103.
- [3] 陈建宪.神话解读·母题分析方法[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14-15.
- [4] 刘铁梁.中国民俗学发展的几个阶段[J].民俗研究,1998,(4):81-89.
- [5] 袁珂.神话论文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64.
- [6] 玄珠.中国神话研究ABC[M].上海:世界书局,1929:57.
- [7] 袁珂.中国神话史[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26.
- [8] 陈梦家.高禘郊社祖庙通考——《高唐赋》[J].北京:清华大学学报,1937,(3):446-472.
- [9] 萧兵.神妓、女巫和破戒诱引[J].民族艺术,2002,(1):79-96.
- [10] 赵逵夫.《九歌·山鬼》的传说本事与文化蕴蓄[J].北京:北京社会科学,1993,(2):51-53.
- [11] 韩高年.《山海经》西王母之神相、族属及其他[J].西北民族研究,2013,(2):177-182.
- [12] 顾颉刚.《山海经》中的昆仑区[J].中国社会科学,1982,(1):3-10.

〔责任编辑 王元忠〕

A Review on the Study of Chinese Goddess Mythology in ancient times

—Concurrently Discussing the Methodology and Research Significance

MA Yuzhen

(School of Liberal Arts, Lan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Lanzhou Gansu 730050, China)

Abstract: Chinese goddess mythology in ancient times is the vivid representation of Chinese nation's culture and aesthetic habits. Although Chinese mythology has long history, it was not the mainstream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early times and was not studied for a long time. Until the beginning of 20th century, some scholars who accepted western thoughts started to study on mythology. Through the studies of some Chinese goddess, such as Nu Wa, Chang E, Jing Wei, Gaotang Goddess, Shan Gui, West Queen etc., these scholars uncovered the prelude of the study on ancient mythology. The perspectives and methodology of these studies are various; especially the use of the double and triple demonstration methods of western mythology is worth of noticing. Although this is not a long period, the achievements are still rich. The studies of scholars of different period are imbalanced and not systematical; therefore, the review of the studies, especially on methodology and research significance, is meaningful for future research.

Key words: Ancient goddess; studies of mythology; the status of female; cultural heritage